



往事如花

□刘兆林

那次代表大会对于我,确如阳春天气的一次复活节。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一度蒙辱的名字又真切地出现在庄严的选票上,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前后左右,任我崇敬,许我圈点。那时的选票,跟现代化毫不沾边,所有程序都是手工操作。因为年轻,我有幸被大会任定为计票员,曾当过小八路的作家邓友梅先生是监票员。不足500人的选举,我们一伙唱票员、监唱员、记票员和监记员,一丝不苟忙活了两遍,到深夜才准确统计完毕。第二天在会场、饭堂或院子里再见到被自己一笔笔记过票的主席团和理事会当选者们,我都会暗自兴奋一番。公布当选的主席团名单是:主席茅盾;第一副主席巴金;副主席按姓氏笔划排列为丁玲、冯至、冯牧、艾青、刘白羽、沙汀、李季、张光年、陈荒煤、欧阳山、贺敬之、铁依甫江。另外还有一群鼎鼎大名的作家、诗人当选理事,那一长串名字连同形象、声音再次在心头深深打下烙印。一个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年事颇高满头白发的老者拄着拐杖颤巍巍走进会场卫生间,听有人称他朱光潜先生,我不由大吃一惊,肃然起敬,一时竟解不出人来。

大会期间,团中央特意为30岁以下代表安排了一场联欢舞会。那时的舞会算是新生事物了,我受到邀请,但手拿请柬却犹犹豫豫不敢参加,是一位老领导要走我手里的京剧票,我才红着脸硬着头皮去了舞场。30岁以下代表不多,舞场里人自然也不会多,我坐在角落里,看人家跳了一曲又一曲,就是不敢下舞池跳上一曲。直到最后一曲已奏响好一会儿了,我才忽然心血来潮,决心跳上一圈,以免遗憾。就在此时,舞会结束了。事已

40多年,我仍遗憾自己思想解放的步子太慢太慢。

开不败的花朵

2006年11月底,第七次全国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年过百岁的巴金主席已经辞世。此前的六代会,巴金主席便因病未能出席,他那次的祝辞,是别人代为宣读的书面稿。所以,七代会最先一件事,当然就是向巴老及六代会以来去世的作家们默哀。百岁而安然辞世的巴老在作家们心中已是永生的。

七代会选举的票箱已十分现代化了,投票口严密得与制式的选票宽度以至厚度严丝合缝,想投进一张假票或多投一张真票都绝无可能。当开始投票的乐声奏起,主席台前排同志起身投票时,有工作人员走到已90多岁的马识途先生身后帮助他起身,不慎碰倒了马老身后我桌上的茶杯。刚刚泡上的一杯滚茶,一下淹了桌上我那张选票。当轮到我投票,那张泡肿的选票怎么也塞不进去了,只好交给工作人员处理。

三代会时那种一张张唱票计票的方法早不用了,投票结果很快公布出来,上千人的会场爆发出热烈而有力的掌声,仿佛中国文学一下年轻了50岁。新主席在新一届主席团和全委会上谦逊、热情、沉着、全面、感人且有文采的讲话,让大家感觉新的领导集体又很成熟从容。10年光阴匆忙又兴高采烈地过去了。我已由对老前辈崇敬得一时解不出原来的青年,变成对优秀中青年作家们自愧不如的老代表,心情自然不会动不动就激动万分或一落千丈了。离会那天的一个细节被我平静地摄入傻瓜相机,至今犹在眼前:在代表们下榻的酒店门口,正好遇见马识途先生被铁凝主席搀扶着准备上车返程,一老一少,一个声朗朗,一个关爱有加,诚如即将分手的亲情父女,让人感到作家协会就如作家之家一样,暖意融融。

10年过去了。中国文学以从来没有过的英姿走向了世界,中国文学开不败的花朵也越来越美妙迷人。



□武 韶

望着窗外飘飞的雪花,看着桌上的台历:上面写满各种标记,有文学会议,有文学采风,还有各种与文学相关的座谈会;当然也有完成各种作品的时间、投递的时间、发表的时间,看上去显得乱糟糟的,但仔细看去,台历依旧崭新,好像才刚摆上,似乎这一年也才刚刚开始。其实,却是马上就要与之永久分别。感慨之中更是蓦然发现第九次作代会召开已经近在眼前。无法不感叹时间如梭,因为5年前第八次作代会的场景依旧清晰,可如今第九次作代会却已近在眼前。

5年的时光,似乎有些缓慢、悠长,其实又很是短暂、急促。第八次作代会那年,我应该还算年轻,精力还异常旺盛。作家相聚总是欢声笑语,加之又有好多谈得来的好朋友,每天都是很晚才睡,话题广泛,谈读书、谈创作、谈生活,似乎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虽然睡眠很少,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开会、讨论、参观、观影,晚上还能打开电脑,将没有写完的某篇小说继续写下去。

如今,想起马上到来的文学相聚,想起相似场景又要重现,但与5年前相比,心境已经有了太大的变化,已经变得沉静下来,更多的则是思考。文学面对当下瞬息万变、五彩缤纷的生活,应该呈现怎样的姿态?文学作品到底应该写什么、表达什么?当下文学的力量是在增强还是减弱?作家书写现实生活的能力是继续强劲还是已经退化?……我忽然发现,许多过去忽略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又在重新拷问我们,正在等待我们给出新的答案。

在过去的5年,我把写作的时间更多的让位于“行走与阅读”。不同的人对行走有着不同的称谓,或是考察,或是采访,或是采风,但无论怎样的变换称谓,其核心就是“走”。一个写作者,不能离开“走”。所谓“走”,就是与社会交谈,就是与社会对话,就是“登高而招”。

在我参加的许多行走、采访、采风活动中,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走边防”活动,印象最为深刻。那年走访内蒙古边防部队,我们用了20多天的时间,走了内蒙古的8千里边防线,一路上采访了众多的边防军人,尤其是一个叫“算井子”的戈壁滩,更是给我留下深刻记忆。那个地方,面积是北京的1.5倍,但人口极少,边防战士加上牧民,竟然只有12个人。茫茫戈壁,没有树,没有鸟,没有房屋,只有蓝色的天和深灰色的地。站在戈壁滩上,没有任何参照物来印证自己真实的存在。来到“算井子”边防派出所那天,已近黄昏,放下行李,我尝试着一个人向前走,不回头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当我突然回头,看见边防派出所的红砖院落变成一个渺小的红点时,内心突然恐惧起来,感到无助、迷茫、恐慌,甚至隐约感到身体在颤抖。我急速往回跑,好像跑慢一点儿,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就会被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野兽所吞噬。当我看到派出所的红砖院落逐渐变大时,心里才逐渐安妥下来。当晚在与边防战士座谈时,长年不见人、几乎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的战士,什么也说不出,好像已经不会使用嘴巴,就是那么怔怔地看着你。看了,眼圈就会慢慢发红。至今想起那个场面,我还会禁不住流下眼泪。采访回来后,我整理了大量资料,写了许多关于内蒙古边防战士的散文、随笔和小说,用文字向读者介绍边防军人戍边的艰苦和伟大。

行走,让我体会到了许多人生感悟。这些感悟慢慢地叠加起来,肯定会影响我的思考方式。当然,也会影响我的写作。我始终在思考,写出来的文字如何更有意义,如何才能避免风花雪月,如何才能避免无病呻吟,应该让每篇文章都能在生活的河床经受生命之水的冲刷、洗涤。

阅读,已经逐渐成为这些年我在生活中的最爱。我喜欢读完一本书后,写下阅读笔记。这些笔记,其实就是把阅读时随意写在书籍空白处的文字整理、加工、润色而成,完全是彼时彼刻内心真实的想法、真切的感受。正是在大量的阅读中,我才越发感受到文学疆域的无比辽阔,也才能不断拥有向上、向前的动力。每隔一段时间,把读过的书和写过的笔记同时拿出来,再相互作一细致的比较,有时又会发现新的感悟,也会矫正之前的判断。如此反复,在一种特别的乐趣中,总会找到特别的惊奇。阅读,同时也是压制浮躁的最好良方。它能让人沉静下来,思考自己的不足,找出问题,从而更好地轻装前行。行走,是阅读;阅读,也是另一种行走。

2016年已近年末。作协九代会就要召开,只要生活在继续,文学就不朽,就会永远与生活结伴前行,并且互相映照。

待到山花烂漫时

□李寂荡



常感谢各界领导和朋友们的支持,让我走到了今天,让《山花》走到了今天。

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山花》取得了一定的业绩。《山花》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国推举文学新锐的一大重镇。由于《山花》一直坚持向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图书馆赠阅,也引起了国外文学界的关注,部分作品被译介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还有小说经泰国诗琳通公主翻译后,在泰国出版。尤其是,作为贵州省惟一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山花》向全国推介了大量贵州本土作者,发现并培养了大量本土文学新人,为贵州文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会举办期间,我的诗集《直了集》也将出版。从事编辑工作以来,尤其是当了主编之后,我的许多精力用在了审稿和跑广告上,为杂志的质量和杂志的未来操心,这是一个主编理所应当的职责所在,但不得不说,这也进一步压缩了我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好在总是会有一些珍贵的间隙,让我有机会在诗歌中抒发种种体悟。这本诗集,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结集出版,我把它看成一次总结,亦将是我重新写作的开始。

参加这次作代会,是我文学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将成为我再次出发的一个新起点。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进一步编好《山花》,让《山花》继续在云贵高原上灿烂怒放。

第九次全国作代会将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全国作代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因此,我对大会充满了期待。能参加大会,是对我在文学方面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参加大会,将会有幸聆听到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相信会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迪。同时,大会亦将是作家们相聚交流的机会,我作为文学期刊的主编,也将是和作家交朋友、谈创作和约稿的一次大好机会。

此刻,我想说的是,文学左右我的命运,或者说文学就是我的命运。

我自幼喜爱文学,中学时便开始诗歌写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濒临倒闭的矿山企业,不管生计如何窘迫,一直坚持文学的梦想。1996年,我考上了西南师大的研究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与我的生活、前途再一次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临近毕业时,到学校来要人的单位很多,那时研究生还很少,很抢手。来的单位高校居多,竞相开出各种待遇,譬如,安家费、住房、解决配偶的工作,等等。那时,我读书所在的重庆刚升为直辖市,党政机关需要大量高学历的文科生。我也去面试了一家单位,但又不想去了,后来这家单位领导亲自打电话做了我的思想工作,要我留在重庆。

但我最终还是到了贵州,到了《山花》编辑部做编辑。其实,在毕业前一年我已经到《山花》实习了。介绍我到《山花》实习的,是我的老乡王鸿儒先生,他当时是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是一位历史小说家,也是一位学者。应该说,王老师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之一。那时《山花》的主编是何锐先生,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有独到的文学眼光、开拓精神和魄力的编辑家。他平时不苟言笑,神情严肃,偶尔一笑,你便会觉得难得,就像阴天忽然露晴一样。

那时的《山花》已经是全国的名刊了,杂志给人“孤傲”之感,但到了编辑部,却觉得很有人间烟火气。我到《山花》,住的地方是曾经的《山花》编辑部,三间房,门上还挂着有“小说组”、“诗歌组”、“评论组”字样的牌

转眼间,我来《山花》17年了,做主编已7年。我非

2010年晚秋,我离开熟悉的乡村走进一座叫做固原的城市。因为女儿到了上学年纪,进城成为必然要走的一步。固原是一座很小的城市。有多小呢,18岁开始我在这里念过4年师范,第一次闯进小城求学的时候,我睁大好奇的目光怯生生打量过它,静静地观察,默默地感受,母亲做的布底鞋在水泥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着。那时候我是多么惊奇,感觉小城好大啊,需要多少个我们那样的小山村才能抵得上这样的大和繁华呢?学生时代的我只是过客,和小城的关系只是4年的寒暑假。

7年后我重归小城,首先租住在城中村一家院子里。除了正常上下班,闲暇之余,我带着女儿在小城里漫步。脚步很快走遍了这片城中村的每条小道,每个深巷,或远或近地观察很多活动在这一带的男女老少。城中村是个奇怪的所在,它算不上真正的城市,但是又在城市的怀抱里,它凌乱、粗糙、污水遍地,垃圾横行,但正是这样的粗糙和廉价,接纳了像我这样刚刚走进城市的农民工。甚至活动在这些的更多的人生比我还艰难,他们是打工者,有着一个时代赋予他们的身份——农民工。



我们居住的小院是个刚刚盖成的违章建筑,门口堆着未完工的水泥沙子和砖块,夜里房主雇佣的人手开始干活,借着夜色掩护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盖二层。我蜷缩在冰冷潮湿中,听着叮叮当当、层层叠叠的敲打,在诡异的气氛中怀着一点难以说清的情愫慢慢入睡。那时候我腹中怀着我的第二个孩子,而丈夫远在乡里教书。那个寒冬的酷冷让我一辈子铭记。也正是这一年,我们聆听到城市里除夕夜晚的鞭炮。之前我们居住在回民村庄,逢年过节只能依稀听到一点点鼓声从隔壁传来。城里的鞭炮铺天盖地。我们没有电视,没有春节晚会可看。我们在街上走了

草木般向上生长

□马金莲

走。空气里有硝烟味儿。我们一家三口呼吸着这奇异的味道,在寒冷中沿着忽然空旷了许多的街道走。年关,很多城里人去乡里过年,很多打工者也回了老家。我看到霓虹灯像往常一样眨巴着五彩的眼睛。最后我们在稀疏下去的鞭炮声中相拥入睡。

跟小城里的每一个人一样,我慢慢地一点点地熟悉了小城的大街和小巷,认识了街畔的绿化树木,绕过大半个城去最古老的图书馆借书还书,一次次徘徊在小城惟一的读者书店买回需要的刊物,夏夜的时候借着散步去附近的夜市上拎回最便宜的发蔫的菜蔬果木。日子就这样有了烟火气息,有了精打细算,有了疼痛和喜悦,有了恒久的滋味。

后来我们搬离了城中村住进了单元楼,这里是固原最早开发的小区,在飞速变化的社会里,它已经是老小区了。老小区,自然具备着一些难以

预料的麻烦和破绽。某一处水管子忽然就破了,暖气管也破了,绿化远远不够,没有锻炼活动场地,管理不严,小广告贴满了楼道,单元门锁坏了没人修。有时候我们会抱怨,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抱怨。生活变得有序、繁忙、按部就班,几乎所有的周末就往老家跑,看寄养的儿子和年迈的公婆。我们常常在灯下算计着下个月要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我们憧憬着不再背负贷款的日子将有多么轻快。我们像这个时代、这个小城里最普通的无数家庭无数夫妻一样,过着柴米油盐斤斤计较的小日子。我们庸常而俗世,但是也勤勉而心怀善良。

小城四季分明。从春夏到秋冬,时序一年一年安静地重复演绎。就在这演绎的过程里,我们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携裹,在车轮下滚滚向前,时代在个体心里碾压下相似又不同的印痕。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应该有的生命状态,怎

样地过一辈子才不算是辜负?常常在读书写作之余,我望着高处的夜空发问。有时候十分孤独。这孤独是无法诉说也无处诉说的。只有庸常的温暖的日子才可以消解。想起裂变搬迁中的村庄,想起远去的往事,想起已经离开世界的那些乡亲,就这样审视着自己的无能和无助。我借助文字,要表达什么,能准确地表达什么,文字究竟能不能抚慰孤独的灵魂?在疑问中我审视着自己写下的文字。也许是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经历,让我具备了一种坚韧的品质,也具备了一种最基本的底层原色。我构思书写和表达的角度始终只愿在最底层。甚至贴着地皮,《长河》是这样,《马兰花》是这样,今年尝试拓展书写视野的新作《贴着城市的地皮》《旁观者》《平安夜的苹果》都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我觉得自己在把一种良苦的心意灌注在文字里。在最新中篇《梅花桩》《人妻》中,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悟。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准确定位的那个点,就是写底层,除了写农村的底层,也写城市里的底层,关注他们的命运,探询他们生命里最幽深的角落,挖掘这一最广泛群体生命历程里

的故事和闪光点。感谢我身边的良师益友,感谢我的编辑老师,他们第一时间接受了我在题材方面的悄然拓展和局部转变,并且给出了最诚恳的建议和指点。这让我感觉不再孤单,在他们的目光里脚步也变得坚定。写了16年,坚持得绝不轻松。但是书写让我的心和整个人生变得丰厚,这是值得的,那么多人在我的作品里读到了独有的喜悦和感悟,这让我觉得更是值得的。

在西海固的大地上,山洼里山头上路畔边大风里旱塬上,随处长满了草木。高的树,矮的草,草木和我们为伴,为我们枯燥的日子增添了活色,草木无言,草木有情,草木坚韧,草木聆听大地的脉搏也感恩着大地的滋养。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偏远地区的“80后”作者,在文学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呵护,他们像呵护一株草木幼苗一样呵护我走过了16年,拿什么回报这样的恩与情?惟有继续写,用心写,倾注生命的精华去写,用作品呼应关注自己的目光。今年能参加第九次作代会,对是一种鼓励,也是鞭策,以后的日子我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像西海固的草木一样,把根扎在泥土里,向着阳光和天空的方向,努力向上生长。